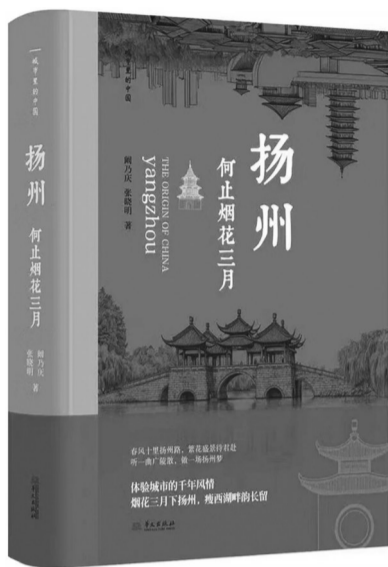


何止烟花三月

□方晓伟



《扬州：何止烟花三月》
阚乃庆、张晓明 著
华文出版社
2025年11月

翻开阚乃庆、张晓明所著的《扬州：何止烟花三月》，仿佛踏上一艘溯流而上的漕船，顺着运河的碧波，迎着长江的巨浪，穿越七千年的岁月风尘。

扬州作为积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，长期以来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，相关著述在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。《扬州：何止烟花三月》以其鲜明的学术定位、系统的结构与深度的逻辑建构，突破了传统城市传记的叙事局限，通过对“扬州何以成为扬州”这一核心命题的学理性回应，形成了与同类著作的显著差异。

从文本结构来看，该书创新性地借鉴《史记》“本纪”“列传”“典志”“舆图”“年表”的体例框架，形成了逻辑严密的学术架构。这种结构设计使著作超越了

普通城市传记的范畴，成为以扬州为个案、折射中国传统城市发展规律的“微型文明史”，其核心学术目标在于揭示城市与运河、国运之间深层的共生互动关系，为同类城市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样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该书在学术叙事中秉持“直面历史真实”的研究态度，并未回避扬州近代以来的衰落历程。在历史演进维度，著作始终围绕“运河—国运”这一核心逻辑展开，将扬州城市命运嵌入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场域，构建起“原点奠基—盛世繁华—乱世顿挫—转型重构”的清晰兴衰逻辑链。从夫差开凿邗沟奠定“南北枢纽”基因，到汉唐依托运河成为“丝路交汇节点”，再到宋元因南北对峙沦为“军事前线”，直至明清借漕运盐务重回鼎盛、近代因交通格局变革走向边缘化，这一逻辑链清晰揭示了扬州发展与运河功能演变、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同频共振关系，打破了“扬州仅存烟花三月诗意”的片面认知，为理解中国传统城市“因水而兴、因运而盛”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典型个案。

在人物群像维度，著作秉持“众生平等”的学术视角，突破“帝王将相中心论”的传统叙事局限，将帝王、大儒、文人、工匠、盐商、平民等不同阶层人物纳入研究视野，通过解析个体命运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，解构扬州的精神光谱。从夫差、杨广等政治人物对城市格局的塑造，到董仲舒、李白等文化人物对城市气质的滋养，再到史可法等忠义之士对城市精神的铸就，以及市井民众对城市生活肌理的建构，形成了多层面、多维度的人物研究体系，实现了对城市精神内核的立体化阐释。

在生活肌理维度，著作以“雅俗共生”为核心分析框架，深入剖析扬州生活美学的文化内涵与形成机制。通过对“皮包水”早茶文化、“水包皮”沐浴习俗、古典园林造园艺术、非遗工艺传承等生活现象的学理性解读，揭示扬州“崇文尚

雅”与“市井烟火”双重特质的生成逻辑——这种生活美学并非刻意为之的精致，而是城市在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自觉，是商业资本与文人审美、精英文化与民间传统相互交融的产物，为城市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。

在地理基因维度，著作以“江河交汇”为核心分析视角，解析地理空间对扬州文化形态的塑造作用。扬州地处江淮之间的南北过渡带，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，这种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了其“漕运咽喉”的交通地位，更塑造了其“兼容并蓄”的文化品格。书中通过语言、饮食、宗教、民俗等文化现象的实证分析，论证了扬州作为“南北文化缓冲区”的学术命题——江淮官话的语言特质、淮扬菜的烹饪风格、多元宗教的共存格局，均体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，为地理人类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。

正如两位作者在《自序》中所述：“地处长江和运河节点上的扬州，注定要在中国历史翻云覆雨的朝代更迭中消长，在荒芜与繁盛之间摇摆。战时是烽火前线乃至南北界线，平时则繁荣鼎沸，卓然大都。少则几十年，多则300年，每逢改朝换代的节律响起，扬州差不多都会在南北拉锯战中遭兵燹血洗，清角吹寒，成为芜城。而天下甫定，这座城市就会从血色黄昏中恢复元气，浴火再生，不屈不挠地重新生长，成为东南一大都会。放眼中国乃至世界，很少有像扬州这样的城市，与一条人工河流如此紧密相关，与国祚运如此相生相依，不可分割。血腥与杀戮，繁华与生长，死亡与重生，扬州见证了历朝历代的人间悲欢，诠释了战争与和平的巨古含义。”

合上书页，运河的涛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。《扬州：何止烟花三月》不仅是一部城市传记，更是一部文明启示录。它告诉我们，一座城市的伟大，不在于永远繁华，而在于历经兴衰更迭，仍能守住自己的根与魂。

疲惫女性的归乡之旅

□张无极



《天气好的话，我会去找你》
[韩]李到禹 著 徐丽红 译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韩国作家李到禹的《天气好的话，我会去找你》，不以戏剧化的情节打动人心，而是以“慢”为针、“陪伴”为线，将一个疲惫女性的归乡之旅、一间乡村书店温暖日常，缝合成一首关于和解与重生的长诗。

“晚安书屋”是全书的精神内核，它不仅是北贤里一间小小的独立书店，更是被都市生活压垮者的心灵避难所。半旧的书架、取暖的炉火、烤橘子的焦香，还有定期聚集的晚安俱乐部成员，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治愈空间的核心。

主人公陆海媛从首尔逃离回乡，带着职场疲惫与心灵伤痕，选择在书店兼职。对她而言，书店不是工作场所，而是喘息之地：整理书籍时，指尖触碰到书页的质感能让她暂时忘却焦虑；听俱乐部成员分享故事时，她发现“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痕”；甚至只是在炉火旁发呆，看着窗外的雪，都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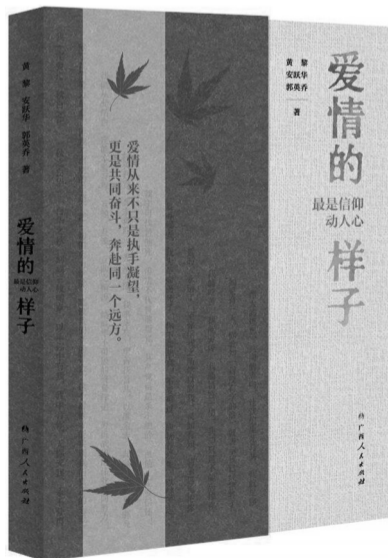
“晚安俱乐部”没有年龄、身份的界限：有退休的老人、上学的孩子、返乡的年轻人，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聚集在这里，读书、写作、分享生活。有人分享失业后的迷茫，有人诉说亲情的隔阂，有人谈论书中的感悟，这些坦诚的交流，像一缕缕阳光，照亮了每个人内心的角落。

另外，值得称道的是李到禹的叙事节奏，像北贤里的冬天一样，缓慢而坚定。他没有设置激烈的冲突、狗血的情节，只是聚焦于陆海媛归乡后的日常。这种“无剧情”的叙事，恰恰是全书最动人的地方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治愈就在“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、好好生活”的琐碎日常中。陆海媛的转变，是慢节奏治愈的最好证明。刚回乡时，她封闭自己，不愿与人交流，甚至害怕听到风声（风声是她童年创伤的象征）；而在书店的日常里，她慢慢学会了“感受生活”：跟着俱乐部成员一起烤橘子，体会食物的香气；在读书会上分享自己的画，重新拾起对美术的热爱。

《天气好的话，我会去找你》最珍贵的，不是陆海媛的个人成长史，而是“晚安俱乐部”成员间互相陪伴的温暖群像。比如，一位老人分享自己老伴去世后的孤独，其他人没有说“别难过”这类苍白的安慰，而是静静听着，有人分享自己相似的经历，有人递上一杯热茶，有人说“以后我们常一起读书”。这种“陪伴式治愈”，比任何大道理都更有力量。

革命伴侣的不朽爱情

□李钊



《爱情的样子——最是信仰动人心》
黄黎、安跃华、郭英乔 著
广西人民出版社
2024年9月

美好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是坚定无悔的承诺，是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是相互扶持的成长，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？我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而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，有一群人，他们是心心相印的伴侣，也是风雨同舟的战友，他们的爱情分外浪漫，眼中饱含了家国大义，眼底藏有对伴侣的默默温情，即使身陷囹圄，始终相互牵挂，哪怕献出生命，也从未放弃信仰。当我们穿越历史长河，不仅可以看到革命爱情的别样浪

漫，更可瞧见爱情最美的样子。《爱情的样子——最是信仰动人心》讲述了24对革命伴侣在烽火岁月中的爱情故事，他们相知相爱，互勉互励，当爱情与信仰使命相遇，他们炙热忠贞的爱情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执手凝望，更呈现出爱情的另一种高度——怀揣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，奔赴同一个远方。

革命年代的红色爱情，承载着战火的无情，更饱含着爱意的珍贵。无数革命伴侣，为了信仰和使命而英勇赴义，共产党人陈党和赵云霄在充满血泪的遗书中记录着他们的革命爱情，他们因理想而相爱，因主义而结合，陈党在就义前写的绝笔信里回忆了两人留学时的甜蜜岁月，“互相切磋，互相勉励……形影相随”，也记录着他对妻子的绵绵情意，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并蒂莲，夫妻恩爱永，世世缔良缘”。他们的爱情里没有礼物和鲜花，只有烽火和硝烟，但他们用热血浇灌革命爱情的红色花朵，绽放在祖国的漫山遍野。电视剧《潜伏》里余则成和翠平在危机四伏的敌后潜伏过程中，因革命工作需要而扮演假夫妻，产生了真挚深刻的感情，最终成为真夫妻，虽然结局让人意难平，可妙不可言的缘分却常引人感喟。而革命现实中，罗亦农和李哲时的爱情也是因假扮夫妻而始，在共同生活和奋斗的104天里，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，也是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，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而惨遭枪杀，成为妻子李哲时永远的怀念，直到69年后重回丈夫身边。在革命战争年代里，太多恋人为了革命事业天人两隔，即便白头偕老如周恩来和邓颖超，也因为革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但是他们始终无怨无悔，在追求信仰的同时也追求爱情，但是同样甘愿为了信仰放弃一切。

他和他，既是寻常生活里的普通恋人，也是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战士，他们的爱情交织着忠诚、牺牲、理想和执着。特殊时代里的爱情，不可避免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一日三餐一两人的平凡生活是十分宝贵的，他们的短暂相守和别离时的飞鸿传情，都伴随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歌颂、对敌人的痛斥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。这些个体的爱情故事可视为一面面镜子，映射出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变革，更体现出革命者在逆境中的坚韧和执着。琼崖革命先驱王器民与妻子高慧根，在革命的道路为共同的信仰和使命同舟共济、并肩作战，却聚少离多，难以顾及自己的小家。就义前，王器民虽然舍不得娇妻幼子，但在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，他写到“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，革命就没有成功的日子，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，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。”左权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级别将领，他34岁成家，37岁血洒十字岭，与妻子刘志兰的婚姻生活十分短暂。在筹划百团大战期间，他将妻女送去延安，这段日子里，他将对爱人和女儿的思恋付诸笔端，写成一封封充满亲情、激情与爱情的书信。“志兰！亲爱的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分离二十一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？”这封信，道尽他人生最后的温柔，写完这封家书三天后，他在十字岭战斗中牺牲。刘志兰在回忆文章《为了永恒的纪念》中写道：“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刻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、崇高的牺牲精神，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。”

无论是刑场上的婚礼，还是雨花台下丁香的故事，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一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，也映照着一代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。